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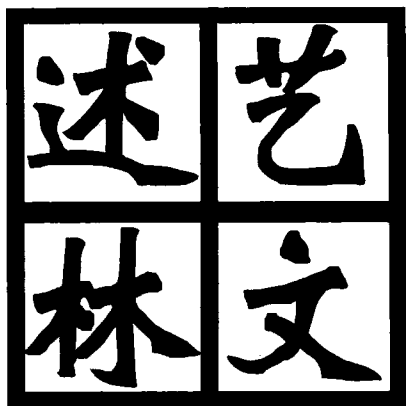
艺文述林

古代文学卷



1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1

古代文学卷

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编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艺文述林

第一辑 古代文学卷

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编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海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4 字数 300,000

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,000 册

ISBN 7-5321-1545-3/I·1231 定价:18.00 元

7-003/20
7-003/24

《艺文述林》

编辑委员会

主编:

齐裕焜 郝铭鉴

编委:

马重奇 王光明 孙绍振

齐裕焜 李万钧 李延瑞

汪文顶 陈庆元 陈朝华

张善文 郝铭鉴 姚春树

高国平 倪宗武 戴永寿

古代文学卷:

执行编委:

齐裕焜 陈庆元 张善文

责任编辑:

陈朝华

封面设计:

黄健畚

目 录

说“史家之绝唱”	陈祥耀 (1)
先秦两汉文艺心理学思想之比较	翁银陶 (25)
从言事分纪到言事相兼 ——中国古代史学与史传文学发展一次质的飞跃	郭 丹 (39)
论诗小札	吴小如 (49)
乐府·古诗和民歌	曹道衡 (61)
乐府诗三题	张伯伟 (76)
东晋文学书法绘画的相互通融	张可礼 (87)
萧衍文学论	陈庆元 (102)
庾信在梁仕历考	林 怡 (117)
唐文宗大和七年文学编年	傅璇琮 吴在庆 (130)
“盛唐气象”的审美特征	林继中 (144)
论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朝诗坛的影响	肖瑞峰 (159)
椎轮大辂:论敦煌词的创作特征与艺术本质	乔 力 (171)
“应歌” ——花间词的原生态及其评价	欧明俊 (181)
试论唐宋词的“以柔为美”及其婉媚之态	杨海明 (193)
宋代哲理诗的一座奇峰 ——论邵雍独创的“康节体”诗歌	张善文 (204)
略论古典诗歌审美的横向比较	陈定玉 (220)

明代小说与市民文化	齐裕焜(241)
略论唐前志怪中的爱情小说	陈 节(250)
《快士传》平议	欧阳健(260)
传奇戏曲的艺术手法与道教审美情趣	詹石窗(272)
《水浒传》与水游戏的关系	涂秀虹(280)
《弹指词》浅尝	邓乔彬(294)
厉鹗山水诗初探	王英志(317)
论闽刻本的价值	连镇标(329)
中国古代文人与佛学关系浅析	刘 蕤(343)
《昭明文选研究》序与后记	曹道衡 穆克宏(354)
评陈庆元教授的《沈约集校笺》	林女超(360)
编后记	(364)

说“史家之绝唱”

陈祥耀

古今评《史记》者多矣，而赅括传神，莫如鲁迅《汉文学史纲要》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二语。今标此题，仅取前语，以为“无韵之《离骚》”者，乃“绝唱”之重大特色，“绝唱”既明，特色自见。夫以《史记》之包罗宏富，专书详闡，已不能尽；况兹短文，何能为役？特以讲述所需，姑揭其大端而略叙焉。

一日博学多闻而裁择精审也

司马迁父谈，为汉史官，博学有识，读《论六家要旨》可见；迁世其学，禀受自丰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“年十岁，则诵古文。”是迁幼年，则能读以古文字写或易古文为汉时字之书，若《史记索隐》引刘伯庄语所谓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系本》（即《世本》）一类经籍也。其后，于经古文，则如《汉书·儒林传》云：“司马迁亦从（孔）安国问故。迁书载《尧典》、《禹贡》、《洪范》、《微子》、《金縢》诸篇，多古文说。”于经今文，则曾就教于董仲舒，以究《春秋》之义，《自序》所谓“余闻董生”云云是也。幼诵载籍，又兼受今古两大经师之学。谈“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”，于“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”之地，得“细史记、石室、金匮”之书，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王迹所兴，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”，“拾遗补艺”，“厥协《六经》、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语”（引见《自序》）。《史记》所引或及见之书，残佚或世所不传者，有《世本》、《楚汉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及序、《铎氏微》、《虞氏春秋》、《春秋杂说》、《春秋灾异记》、《王制》（清人考非今《礼记》之《王制》）、《春秋历谱谍》、《谍记》、《五帝

系谍》、《尚书集世》、《五德历谱》、《禹本纪》、《秦记》、《长短说》、《令甲》、《功令》、《列侯功籍》、《太公兵法》、《魏公子兵法》及李悝、邹衍、邹爽所著书等。迁之博学可以概见。

然迁不徒博涉载籍，其经历见闻亦至广。《自序》云：“二十而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疑，浮于沅、湘，北涉汶、泗，讲业齐、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射邹、峄，厄困鄆、薛、彭城，过梁、楚以归。”出仕之后，又尝“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南略邛、笮、昆明。”并从武帝巡行及封禅，故《五帝本纪》又云：“余尝西至空桐，北过涿鹿，东渐于海，南浮江、淮矣。”所至之处，多考其山川民俗，稽其史事，如闻长老言黄帝、尧、舜之处，“察其风教固殊”（《五帝本纪》）；自东南而至岷蜀、朔方，察其“水之为利害”，并从“负薪塞宣房”（《河渠书》）；从封禅，入寿宫，“究观方士、祠官之意”（《封禅书》）；适齐，见其“膏壤二千里”，“民阔达多匿知”及太公建国、桓公为政之本（《齐太公世家》）；过鲁，“观孔子庙堂礼器”（《孔子世家》）；过薛，审其里“多暴桀子弟”之故（《孟尝君列传》）；适北边，“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、亭障，堑山湮谷，通直道，固轻百姓力矣”（《蒙恬列传》）；过彭城、丰、沛诸地，考楚汉战争及汉初功臣事迹（《樊、酈、滕、灌列传》）；适楚，观屈原所自沉渊（《屈原列传》），及春申君故城、宫室（《春申君列传》）；适淮阴，观韩信母冢（《淮阴侯列传》）；登箕山，观许由冢（《伯夷列传》）；过大梁，考侯生所在夷门（《魏公子列传》）；在江南，向长老问蓍龟事（《龟策列传》）等，广资印证。《货殖列传》所述各地物产、风俗，它篇所载文、景、武时人事，不少亲见亲闻。又如《田叔列传》，谓田叔子“仁与余善，故并论之”；《酈生、陆贾列传》，谓“平原君（朱建）子与余善，是以得具论之”；《刺客列传》谓“始公孙季功、董生与夏无且游，为余道之（荆轲事）如是”；《游侠列传》谓吾视郭解，状貌不及中人；《项羽本纪》谓“吾闻诸周生曰：舜目盖重瞳子，又闻羽目亦重瞳子”：则见闻益加亲切。凡此诸端，岂徒抱书者所可同日而语乎？

既博学多闻，于“书缺有间”或“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”处，则“深思”以求“其意”，“择其言尤雅驯者”著之（《五帝本纪》）；事多“考信于《六艺》”（《伯夷列传》）；于“誉者或过其实，毁者或过其真”处，可考者考，“疑者阙焉”（《仲尼弟子列传》）；“故言九州山川，《尚书》近之矣，至《禹本纪》、《山海经》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”（《大宛列传》）；“谨其始终，表见其文，颇有所不尽本末。著其明，疑者阙之”（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》）；“故疑则传疑，信则传信，盖其慎也”（《三代世表序》）。故于所述，能“综其终始，稽其成败兴亡之纪”，勒成一书，以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（《报任安书》）。是则裁择精审之功也。

《史记》虽极精审，然内容既广，又属筌路蓝缕之开途，则疏舛处自不能绝。昔司马贞作《史记索隐》，赞其“驰聘古今，错综隐括”，又思“改更舛错，裨补疏遗”而未果。《史记》之补，不自贞始，贞所改动，《四库提要》已病其有未喻迁“言外之旨”及自添“漏略”者，亦可知不容率尔论定矣。前人以为明显抵牾处，如《赵世家》叙赵氏孤儿事，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皆不同；与《晋世家》亦相出入。此或别有所取，或小有失检，未必尽为舛误不经也。即有若干舛误、疏失处，亦不足据以否认其总体之精审。今人顾颉刚《〈史记〉校点序》云：“是书固有甚多之漏误在，然其误后人可得而正，其漏后人可得而补。独其创义定例，会合天人，贯穿古今”，则“未有能与之抗颜行”者。“我辈指摘之者是一事，而古史真相又为一事。以甲校乙，固足以明乙之非，然又何足以知甲之必是？故不得谓我辈一加指摘，即可揭发其事实之真相也。学不求进于古人，何贵乎有我辈？抑徒有求进之心，而不知固其壁垒，则虽取宠一时，终将为不知晦朔之朝菌矣。”顾氏治古史久，自疑而信，即身体验，言之著明，亦读《史记》者深思阙疑之一助也。

二曰开创空前而作用完备也

《史记》之前，古史若《尚书》，则仅保存古文献；若《世本》，

则仅载王侯之世系称谥；若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，则仅收录记言、记事之篇章，有欠于贯串完整者也。若《春秋左传》，编年以纪事，能作具体之贯串，可谓有系统矣；然其言尚简，事又限于一代之政治兴衰，仅足为编年体断代史之开创而已。

《史记》之十二《本纪》，编年以纪帝王之政治大事，继《左传》之体而加详；且起上古而至当代，《自序》所谓“述黄帝以来，至太初而迄”，不限于一代，此则其大开拓也。其十《表》，按时间排比，以至简之言标列大事。关系一代，荒远者有《世表》，如《三代世表》；稍近有《年表》，如《十二诸侯年表》；益近有《月表》，如《秦楚之际月表》，此辅《本纪》而行。关系局部，为汉之王侯将相作者，如《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》、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，此辅《世家》而行。此独创也。其八《书》，纪礼乐者有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；纪律历者有《律书》、《历书》，《律书》且言及兵事；纪天文星象者有《天官书》；纪地理水利者有《河渠书》；纪国家财政经济者有《平准书》；纪帝王巡行祭祀者有《封禅书》。此则开后代“典志体”史书，独创性尤大。其三十《世家》，以叙汉以前列国及汉以后王侯之世代相传事迹，自《吴太伯世家》以迄《绛侯周勃世家》、《三王世家》等，有若专门之“国别史”、“封建史”，亦辅《本纪》而行，上继春秋、战国之各种史记而加完备，有继承亦有开拓。

其七十《列传》（包括《太史公自序》），首为历史人物与当时之边疆部族及邻国独立作传，所谓开“纪传体”史书、开“英雄传奇”、开“人物本位”之史体者，其独创性之大，益为人所共喻。《史记》不独为重要之政治人物作传，且为杰出之文人作传，如为屈原、贾谊、司马相如等作传是也；为有代表性之思想家作传，如为孟子、荀卿、老子、韩非作传是也；为后人所称慕之高人逸士及官吏作传，如为伯夷、鲁仲连及古“循吏”作传是也；为当政者所痛恶而为人民所赞誉之人物作传，如作《刺客列传》、《游侠列传》是也；为人民所痛恶而为当政者所信宠之人物作传，如作《酷吏列传》、《佞幸列传》是也；为有益于世而世犹重视不足之名医作传，如

作《扁鹊·仓公列传》是也；为作用不细而毁誉不一之商贾作传，如作《货殖列传》是也；为小道不废之卑贱人物作传，如作《滑稽列传》、《日者列传》、《龟策列传》是也。眼光所烛，遍及各种阶层及类别，何独仅限于所谓“英雄”耶？为文人作传且采录其重要作品，如录屈原之《渔父》、《怀沙》，贾谊之《吊屈原赋》、《服鸟赋》，司马相如之辞赋、书表，邹阳之《狱中上梁王书》；非文人传中而录及文学作品者，如《秦始皇本纪》之录贾谊《过秦论》，《孝文本纪》之录可取诏令，《乐毅列传》之录其《报燕王书》，《李斯列传》之录其《谏逐客书》；以及其它《书》、《纪》、《列传》中之《瓠子歌》、《垓下歌》、《大风歌》、《易水歌》等，大部分皆赖以保全者，其对文学史料之重视，抑可知矣。

《孟子·荀卿列传》，评论先秦诸子思想，《儒林列传》，记载汉初经籍流传学派，此为思想史、学术史之滥觞；《扁鹊·仓公列传》，记载病例与治疗方法，亦医学之重要史料。《西南夷列传》、《朝鲜列传》、《大宛列传》、《匈奴列传》，为少数民族，为邻国立志传。《匈奴列传》详载匈奴之生活习俗及其与华夏之关系；《大宛列传》详载大宛之生活习俗及与华夏之关系外，且载远及大月氏、大夏、乌孙、康居、条支、安息、身毒之情况。由内及外，包亚及欧，本国史而兼外国史，史识之高与史料之富，至堪惊叹！此又何止以“人物为本位”耶？

《史记》既为起自上古、载近三千年史事之“通史”；又详近略远，不啻可兼西汉一代之“断代史”。既发展史书之“编年体”；又开创其“纪传体”与“典志体”。其内容，既以政治史为主，又兼文化史、经济史、科技史、社会生活史、邻国关系史，与夫文学性极强之人物传记。则不谓之“开创空前而作用完备”不可也。刘知几《史通·二体》评曰：“纪以包举大端，传以委曲细事，表以谱列年爵，志以总括遗漏，逮以天文地理、国典朝章。显隐必该，洪纤靡失，此其所以为长也。”郑樵《通志序》评：“上稽仲尼之意，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之

言，通黄帝、尧、舜至于秦、汉之世，勒成一书，分为五体。《本纪》纪年，《世家》传代，《表》以正历，《书》以类事，《传》以著人，使百代而下，史官不能易其法，学者不能舍其书，《六经》之后，唯有此作。”

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：“十篇缺，有录无书。”颜师古注引张晏曰：“迁没之后，亡《景纪》、《武纪》、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、《兵书》、《汉兴以来将相年表》、《日者列传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龟策列传》、《傅、靳靳传》，元、成之间，褚先生名少孙，所补有明标其名者；其未标者，后人以为有迁作之遗或实迁之作，如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之首，皆有迁序，《三王世家》、《傅、靳列传》、《日者列传》、《龟策列传》，皆有“太史公曰”，则读十篇，犹宜酌观择取。又它篇复有杂入迁死后事者，故赵翼《二十二史札记》，有《褚少孙补〈史记〉不止十篇》、《〈史记〉有后人窜入处》两条，供读者参考焉。

三曰规模宏大而用笔多变也

《史记》规模之大，其见于内容者，包罗宏富，作用完备，一空前古，无与伦匹，具如上述。然其规模之大，不止见于内容而已，其行文气象、笔力之大，亦至不可及。昔苏辙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曰：“太史公行天下，周览四海名山大川，与燕赵间豪俊交，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。”方孝孺《张彦辉文集序》曰：“司马迁豪迈不羁，宽大易直，故其文浩乎如江河，曲尽周密如家人父子语，不尚藻饰而终不可及。”茅坤《〈史记〉钞》曰：“屈宋以来，浑浑噩噩，如长江大川，探之不穷，揽之不竭，蕴藉百家，包括万代者，司马子长文也。”刘大槐《论文偶记》评之曰：“忽起忽落，其来无端，其去无迹。”“气脉洪大，丘壑远大”。刘熙载《艺概》评曰：“《史记》叙事，文外无穷，虽一溪一壑，皆与长江大河相若。”此皆自文章气象以言《史记》之大也。夫司马迁之作《史记》，成一大计划、大目的之整体，各篇各节，皆自此整体中分出，如丛林之百木，江河之支流，人身之血脉，既为此整体之小部分，又未尝脱离此整体，盖

以各部分而组成、体现此大整体。故其行文，不求一篇一节、片言只语之工密，而求整体之自然分布，自然生发，大起落，大包裹，前人之评其疏畅、评其气象大者以此。然如柳宗元《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》、《与韦中立论师道书》，又屡称《史记》之“洁”与“峻洁”；方苞《〈史记〉评语》、《古文约选序》等又屡称《史记》“义法”之密。夫《史记》之“洁”与“密”，在其体大思精之凝炼，在其大事大理之有物有序，不在其细节片言之检束也。前人亦有毛举其辞句之疏失者。盖若以后来文家之修辞细则及今日治“文法”之规律衡之，《史记》之辞句，确有不相合而似可议者；然以其出以自然之神情气象观之，又往往不失疏中之大。故《史记》之规模，乃名山大川之构造天然，非人造园林之小巧布置；其所谓“洁”，乃连峰巨麓之清旷，洪波浩流之澄明，非小丘小壑、小溪小涧之扫除与淳蓄也。

《史记》用笔之多变，如《表》本标目之填列，《书》为实事之辐集，原难用其文采与变化；而迁于诸《表》，乃附以曲折多姿之序文，于诸《书》则事件与见闻、议论杂出，写法不同，有极起伏开阖之妙者。《本纪》、《世家》皆分两类：其一类，总叙一朝一国。其大半，多出以庄肃简要；然亦有简中有详，详处不惜描写淋漓者，如周、秦二《本纪》，宋、晋、楚、越、赵、田齐诸《世家》。其一类，叙一人为主。其事固关系天下兴亡、得失之大端，其性格亦分明见之如《列传》中人，如始皇、项羽、高祖、吕后诸《本纪》，萧相国、曹相国、留侯、陈丞相、绛侯诸《世家》。《列传》有“分传”，写一人；有“合传”，写两人多，写两人以上者，如《樊、郤、滕、灌列传》；有类传，如刺客、游侠、酷吏、货殖、佞幸诸传。分传、合传有兼写他人而不明标者，如《田儋列传》，实兼弟荣、横之传；《张丞相列传》，实兼周昌、申屠嘉之传；《酈生、陆贾列传》，实兼朱建之传；《万石、张叔列传》，实兼石奋二子及卫绾、直不疑、周仁之传；《老子、韩非列传》，实兼庄周、申不害之传。“附传”之文尤多，如《李斯列传》、《蒙恬列传》之附赵高；《张仪列传》之附陈

軫、犀首；《孟尝君列传》之附田婴、冯驩；《淮阴侯列传》之附蒯通；《管、晏列传》之附鲍叔；《孙子、吴起列传》之附孙臆；《樗里子、甘茂列传》之附向寿、甘罗；《廉颇、蔺相如列传》之附赵奢、赵括、李牧；《魏其、武安侯列传》之附灌夫。又有所谓“互见法”者，如管仲、晏婴为政事见于《齐太公世家》者，不载于本传；穰侯魏冉事及信陵君不敢纳魏齐事见于《范雎列传》者，不载于本传；越国事之见于《吴太伯世家》、《伍子胥列传》者，不详于《越句践世家》；晁错请削藩事，详于《吴王濞列传》而略于本传；刘邦、项羽之为人，互见于二人《本纪》及汉初诸臣列传。若《周本纪》云：“其事在周公之篇”，《秦本纪》云：“其事在商君语中”，《秦始皇本纪》云：“语具在李斯传中”，《赵世家》云：“语在晋事中”，《绛侯周勃世家》云：“其语在吕后、孝文事中”，《滑稽列传》云：“语在田完世家中”等，则又“互见”之明白交代矣。合传之人多前后分写，然亦有交叉、映照写者，如《廉颇、蔺相如列传》、《张耳、陈余列传》、《平原侯、主父列传》。

其具体之写法，因篇因人而异，变化更多，难以缕述，姑举其一二。有事件重要、突出，用浓重、紧凑之笔写之，使文章焕发热烈，读者心动，如《项羽本纪》、《高祖本纪》、《吕太后本纪》、《魏公子列传》、《廉颇、蔺相如列传》、《刺客列传》、《淮阴侯列传》、《魏其、武安侯列传》是也；有事件亦重要、突出，却用轻疏、从容之笔写之，使文章参差历落，读者意远，如《秦始皇本纪》、《孔子世家》、《留侯世家》、《陈丞相世家》、《商君列传》、《李斯列传》、《李将军列传》、《游侠列传》。有两人合传而详略不同者，如《张释之、冯唐列传》、《袁盎、晁错列传》；有两人合传而写其事之大小所取不同者，如《韩信、卢绾列传》、《魏豹、彭越列传》；有一人之传而写法亦异者，如《张丞相列传》写张苍之仕履则平叙，而于其父子之身段及苍多饮人乳以养身则详叙，《汲黯列传》于其治绩皆略叙，于其直言敢谏及为人风概则详叙；有传中独详其说人之辞以见其行谊者，如《苏秦列传》；有传中反详他人说己之辞而简述其行事者，

如《穰侯列传》。传文以叙事为主，然亦有以议论为贯串者，如《老子、韩非列传》、《孟子、荀卿列传》；有以唱叹为褒美者，如《伯夷列传》、《管、晏列传》。《史记·田单列传》赞语云：“兵以正合，以奇胜。善之者，出奇无穷，奇正还相生，如环之无端。”移以自状其书写法之多变，实为切合。

四曰信史实录而写人生动也

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称《史记》：“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。”意在继《春秋》之褒贬以垂世训，故《史记》之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，“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”之信史“实录”精神，盖甚显著。然人之善恶得失，常不能以一端论，《史记》“实录”精神之可贵，尤在能不以一端论人。如于商君，病其任法苛刻，然传中又载其变法十年，“秦民大悦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”；于吴起、李斯，皆病其醉心利禄，不择手段，然起传又载其“善用兵，廉平能尽得士心”，争治国之“在德不在险”，于斯传又评其苟不私心误国，有功于秦，“且与周、召列矣”；于汉高祖，病其无赖多诈，然于诸纪传中，又载其豁达“有大度”，“善将将”，王关中与“约法三章”策略之正确；于吕后，病其嫉妒狠毒，然纪中又载其“政不出户房”，而“民务稼穡，衣食滋殖”；于武帝，病其过失甚多，然《匈奴列传》、《河渠书》又载其有防边、治水之功；于酷吏，深恶痛绝，然传中又称“郅都伉直”，赵禹“据法守正”，“此十人中，其廉者足以为仪表，其污者足以为戒。方略教导，禁奸止邪，一切亦皆彬彬，质有其文武焉，虽惨酷，称其位矣”；于卫青、霍去病，病其出身与为人，然传中又备载其战绩，于去病美辞尤多，此所谓“恶而知其美”者也。于伍子胥，爱其孝义忠勇，然传中亦载其报楚之“怨毒”过甚；于乐毅，伤其遭遇，传中且云蒯通等读其报燕书，“未尝不废书而泣”，然又载其下临淄，“尽取齐财物祭器输之燕”之误；于陈涉，爱其有大志，敢抗秦，然世家中又载其妄杀人，用朱房、胡武以“苛察为忠”，致失士心；于项羽，爱其勇敢磊落及抗秦之功，

然于诸纪传中，又载其暴躁与行事用人多误；于张良，爱其知谋，然书中又于其不能抑吕后之虐有微辞；于韩信，爱其将才，然传中又于其热心裂土封王有微辞；于李广，爱其廉勇爱士，然传中又于其杀降羌及杀霸陵尉事有微辞；《游侠列传》，爱侠士之重义，然传中亦载其“阴贼”、“剽攻”之行为，此所谓“爱而知其恶”者也。

《史记》之写人物，多写其主要之行事用心、语言议论，此为具普遍性与必然性之法则，亦它书所不能外，顾视此法则运用之高下何如耳。《史记》运用之高妙，读其纪传，篇篇可见。它如有于他人人口中表现人物性格者，如借御者妻之评晏子，借赵良之评商君，借蔡泽之评吴起，借廉颇之评赵括，借鲁句践之评荆轲，借赵高之评蒙恬，借汉高之评项羽，借韩信之评汉高，借汉文帝之评李广，借鲁两生之评叔孙通，借辕固生之评公孙弘等。有借细节表现人物性格者，如写李斯之叹仓鼠，张仪之以舌问妻，汉高之伤胸扞足，周昌之口吃急言，景帝之目送周亚夫，陈平之割肉，霍去病之穿域蹋鞠，张汤之劾鼠掠治。或一线贯穿写，或四面八方写，大端既显，侧细善收，形容点染，用合天工，故书中人物，性格生动。如鲍叔之交情，虞卿之友谊，伍子胥之沉毅，范蠡之豁达，鲁仲连之高节，田单之奇谋，白起、李牧之用兵，孙臆、庞涓之斗知，苏秦、张仪之反覆，范雎、蔡泽之推排，蔺相如之果敢，廉颇之负气，信陵、孟尝之养士，侯嬴、冯驩之酬知，始皇之雄鸷，二世之昏荒，吕不韦之投机，赵高之怙恶，李斯之知而私，蒙恬之勇而疏，项羽之暴而仁，汉高之宽而诈，陈平之善售计谋，韩信之能用屈伸，张良之明于进退，曹参之甘于规随，萧何之慎以自保，英布之苟以取亡，樊哙之粗而党，周勃之强而木，叔孙通之权变，周昌之急直，石奋父子之谨愿，公孙弘之诈伪，李广之亢烈，汲黯之戆厚，淮南王长之骄横，匈奴冒顿单于之狡谲，刺客、游侠之尚义，酷吏之残忍，林林总总，莫不栩栩奕奕，而光芒四射矣。

以上所言，特概大体；细致分析，亦复有人。如李晚芳《读史管见》之评《李斯列传》云：“太史公之传李斯也，不惟传其事迹，

并其结念之隐亦传之，盖斯乃热中富贵人也。始于仓鼠一叹，太史公肖其神，轻轻描出，令热中者全身俱动，用笔何等超妙！辞师一段议论，千回百转，语语皆从富贵结念中流出，……须眉毕现。其画策为秦并天下，即其专心为己取富贵。及富贵极矣，……又虑富贵把持不牢，阴若有人扼其吭而攫夺者，……惟小人能知小人，早被赵高冷眼看透，即以富贵动之，又以失富贵劫之，……重富贵者，乌能不听？太史公一笔结出曰：‘于是斯乃听高。’仰天一叹，而秦亡矣。……至于上《督责书》，亦为富贵耳。太史公以覆案消让，点明于前，……竟从斯处心积虑中，曲折抉出，似毒笔，实真笔也。是后翻翻覆覆，在高掌上愚弄。……结局一哭，应前三叹，为篇中眼目。其要害不过在‘重爵禄’三字，幻出天翻地覆世界。太史公以劲笔达之，有余慨焉。”汤谐《〈史记〉半解》评《魏其、武安侯列传》云：“魏其荣势以亲交，武安挟诈以肆横，灌夫负气以任性。传内三人都写得须眉欲动，妙矣！尤妙在传外诸人如籍福之委曲调停，三边按捺；安国之心袒丞相，故持两端；当时之是非不爽，畏势游移；天子之实恶武安，碍难自决；太后之一味私情，护持昆弟，无不面面如生。看来他传多作波宕，而此传全着精采，为是花簇已极，更添入闲情不得耳，故即以精采处为波宕处也。”吴见思《〈史记〉论文》之评《李将军列传》云：“李将军战功如此，平序、直序，固亦可观。乃忽分为千绪万缕，或入议论，或入感叹，或入一二闲事，妙矣！又忽于传外插入一李蔡、一程不识，四面照耀，通体皆灵，可称文章神技！吾尤爱其以李将军行军方略，于程不识口中序出；广之为入，反从射虎带下；而其不侯杀降事，偶在王朔燕语点明。错综变化，纯用天机，有意无意之间，令人莫测。……此篇以‘射’字贯，故中间‘射’字，凡十二回合。而首以文帝叹其不遇，末以武帝诫其数奇，前后互挽，是一篇主意。序杀三人处、纵马卧处、生得腾马处、大黄射裨将处，极力摹写，如亲见闻之。他人能忙，此独闲。闲，正其忙处也。他人能整，此独乱。乱，正其整处也。唯史公独能。”李景星《〈史记〉评议》之评《萧相国世家》云：